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七三期 ——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212a)

【思想评论】	“青春无悔”与知青情结	米鹤都
【文艺评论】	白没白活的青青岁月——看电视剧《知青》	黄纪苏
【学者访谈】	不要因自己的怀念，就歪曲上山下乡运动的事实	潘鸣啸
【往事非烟】	当年贫下中农是这样“再教育”我们的	唐 燕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思想评论】

“青春无悔”与知青情结

• 米鹤都 •

◇ 难以评估的评估

知识青年的返城风与文化大革命的结合是相交织的，可以说前者敲响了后者的丧钟，或者说后者又加速了前者的进程。总之，伴随着十年“文革”的破产，大部分知识青年重新回到了城市。一场浩大、劳而无功的社会迁徙运动终于停止了。

这场运动给社会和历史留下了无法统计也难以估量的后果。

在经济上，它一方面给社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每个曾产生过知青的家庭都曾背上沉重的包袱，而国家则为每个知青付出路费、一年的伙食费、工具炊具费和建房费等许多无法收回的投资，这笔数字据说超过100亿。(1) 另一方面，它的确缓解了那一时期的就业压力，至少将这一大批人的生计问题由全民所有制的财政支出中转到了集体所有制的名下，使已陷入窘境的经济机器还能够维持。同时，这批人在建设农村中毕竟以血汗创造了财富，尤其那些偏远落后的地区，各种机械的使用，技术的更新，科技的开发，均得益于上山下乡运动。

在政治上，它一方面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旗帜下，使相当一些知青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损害，另外不少人则在放任中虚度年华以致染上恶习，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它以独特的逆境方式使这批人经受了实践的磨砺，加快了他们的社会化进程。

在文化上，它本身就是对文化的一种反动。它以片面强调实践知识的形式，否定了书本知识和抽象知识的意义。在摧残文化的前提下使这批人深受“读书无用论”之害，成为“被耽误的一代”。〔2〕另一方面，它又促进了城乡之间大规模的、广泛的文化交流，为广大农村举办了一次长时间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展览会，提高了农村的文化水平，并刺激了农村青年们对现代文化和都市生活的向往。在某种意义上，它为而后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做了一定的精神准备。

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整个社会传统的十年断层。它表现在文化上、科技上，以及人材上的断层。断层的真正涵义，在于一代人丧失了他们的青春。上山下乡这十年，在一般情况下这是人们提高文化水平、熟悉专业技术、工作小有成就的十年，而这代人却将这宝贵的时间消耗在重复简单的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上。在一个平均文化水平极低的国度，这是严重的社会资源的浪费；对于这代人来说，则是青春和生命的耽误，使他们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日后在社会中竞争的潜在能力。

断层的涵义还在于，社会出现了错位。在一定发展时期，社会所能提供的空间位置是有限的。而上山下乡将社会对这些位置的有序继承变成无序，出现后代人超越前代人的越位继承。第三代人首先在升学上出现极大的困难，在恢复高考制度后，这代人曾在77、78、79三届大学生中占据优势（这里指的当然不只是老三届这个群体），然而随着年龄的超标、家庭的拖累以及知识的落伍，他们的绝大多数只能是被拒在大学的门外。这代人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包括那些重新回炉和自己摘掉帽子的工农兵学员，充其量不过百余万人，相对于上山下乡的2000万人实在少得可怜。当然不是说人材一定要通过大学才能培养出来，况且还有大批的各种函授、成人教育、自学高考、大专补习班等等。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衡量的指数。在就业方面，待业是伴随他们返城的新名词，他们中的幸运者以不相称的年纪从学徒工、临时工做起，在专业技术上的熟练程度并不优于比他们年轻得多的后代人。而还有相当多的返城知青长期找不到正式工作。当改革更加深入一步的时候，这代人的年纪使他们在我国国营企业的体制改革中首当其冲，下岗这个新名词又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这代人的肩上。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上山下乡对这代人的自身成长过程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通过上山下乡的实践，他们的政治观念彻底改变。许多知识青年目睹了阶级斗争、实质是其扩大化的种种表现，非但没有得出它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必然性的结论，反而感觉到其中具有大量的执行政策者的主观因素，往往成为整人的工具。于是，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之后，头脑中原来绷得很紧的阶级斗争的弦松懈了，看问题的出发点也比较实际了，不再把任何事情都先上到阶级斗争的纲上去看了。通过“林彪事件”，更多地是从自身的社会落差和实践中，这代人体味到指导社会运转的思想体系的问题，而成为中国社会最早觉醒，并向四人帮发出呐喊的社会群体。由于这代人与改革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实际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最积极的社会力量之一。

对旧体制和社会其他弊端的切身感受，又使他们为迎接伟大的改革事业做好了思想准备。

他们的觉醒还表现在他们从当年的个人迷信，从虚幻的集体主义中找回了自我。自我意识的回归是这代人进行历史思索的结果，也是他们极为痛苦的自我否定的结果。“为天地立心，为

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固然体现了一种人生意义，但并非一般人能做到的。而且也不可排除另一种人生意义，生活并不是教条。即在与社会利益发展的同一方向上，最大限度去追求个人能力的发挥，去追求人生的丰富多彩和种种乐趣。同时他们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明白了自己到底是谁！你只是你自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众多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

这代人在上山下乡的变异状态中，认识了真理，认识了社会，认识了人民。他们能够准确地把握“人民”、“群众”这个概念的本质，从而逐渐植根于黑色的土地中。人民不尚空谈，人民真正需要的是生活的改善，社会的改革，需要的是脚踏实地。

另外，这代人在上山下乡过程中经受了许许多多过去未曾体验的艰苦，从生活上和劳动上受到磨砺。他们不仅成为自食其力的合格劳动者，而且培养了坚强的意志。

这样看，这代人失去的主要是和物质有关的，获得的几乎全部体现在精神上。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这似乎有点滑稽。

◇ 青春无悔的歧义

“青春无悔”的提出，源于成都的知青搞的一次“青春无悔”的展览极其出版的图书。据其发起者之一的王晓梅说：“我觉得青春无悔的含义我是这样理解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我是绝对不赞成上山下乡运动，像这样一场运动是对民族和国家的毁灭。而对我们自己来说呢，因为我们在这种环境中间，没有办法的时候，被迫走的一条路中间，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任何生活情况下，在艰难困苦之中，都能得到一种生活的体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财富了。”〔3〕这一理解和立意应该说是对的，但是使用“青春无悔”一词为题，却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或者说词不达意，从而引发了知青们、以至下一代参与的大规模争论。

笔者前些年参加过几次关于红卫兵、老三届和知识青年问题的座谈会或讨论会，其中有两两次是在国内，有两次是在海外。涉及到怎样看待上山下乡和如何评价自身的这段经历上，每次会上，不同的与会者们无形中都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无一例外。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可以大致把它们归类概括为认为“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的问题。这里做一简单归纳。

一部分人认为：在经历过那么一段令人不可忘怀的岁月后，今天回首往事，依然青春无悔。下面简称之为“无悔”，需要说明的是，即使都使用同一词汇，大家对无悔的理解也不完全相同。

无悔的涵义是什么？

有人说，上山下乡曾给知识青年造成了伤害，也带来了收获，有失有得，因此两相抵消，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有人认为，过去上山下乡可能带给我们个人一些伤痛，但时至今日已经没有留下什么心理上的伤痕，因为无伤可疗，也就没有悔恨了。

有人认为，“我并不认为自己不行，并不觉得我们那一代人就生不逢时，因为，人无法选择生活本身，但可以选择生活态度。我的青春诚然是在内蒙古的沙漠里度过的，但我年轻的心没有那一天不是认真的、诚实的，我没有辜负自己的生命。”〔4〕

有人从理想追求的精神境界或历史使命的角度来谈无悔，一位作家这样说：“我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一代知青下乡去追求人生价值，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值得肯定的。每一

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理想，不管他这个理想你后人看起来怎么样评价，但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是应该值得肯定的，我现在还是一直这样的想法。”

有人从人生经历的丰富多采并转化为财富的角度来谈无悔，譬如一位画家回答“客观不幸，主观无悔”时谈到：“主观是否无悔不可能只有一个答案，我可以谈一谈怎么判断你提出的那个‘客观’。现在一些回忆录总是在说‘被耽误的一代’和‘夭折的一代’，我很不赞成。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人，因为中国当代史以来，我们所经历过的很多，在人类历史上都算是大风大浪、是罕见的、荒诞的了，可能以后再不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从人生体验这个角度，这一切对于我们是大大的财富……”〔5〕

有人甚至从自己脱离了“很普通的老百姓”的角度认识问题：“‘文革’也好，上山下乡也好，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种千载难逢的锻炼。如果要没有这种机会，可能我们就是很普通的老百姓，不要说做大事，连见大事也见不到。这种对政治眼光的开拓和对中国国情的切身体会，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都是千载难逢的，实在是很幸运，应该说是一代幸运人。”〔6〕

另一部分人则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民族灾难，上山下乡运动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予以否定，这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当然，在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同时，并不否定这场运动的一些伴随物，它们对红卫兵这代人的成长具有一些正面的影响。但它只是一种坏事变好事，毕竟是从属的，而坏事变好事本身就首先明确了其性质是坏事。因此，我们对在上山下乡中那样地虚度青春当然是悔恨的。

一位学者指出：当年对于个体而言的“下乡”意义也正是整个上山下乡原初所宣传的意义——战天斗地、把自己锻炼成为革命接班人等。当整个上山下乡的意义被否定后，知青也不再从这个角度观照自己行动的意义了。……这样看来，悖论似乎不复存在：即整个上山下乡运动被否定，而知青却执着于“青春无悔”，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仅仅存在于表面。知青的“无悔”已经是另外一种意涵。今天知青的述说，很明显是简单化的、甚至于已忽略掉当年的意义，而去把持另外一套意义系统。事实上，这种行为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意义也是一种否定。〔7〕

严格地说，这位学者的定义是正确的。青春无悔是针对上山下乡而言的，但是多数人则转换为对自己的经历而言，这在逻辑上是一种偷换概念。

有悔的涵义又是什么呢？认识也不尽相同。

有人认为上山下乡是对文化的反动，是对知识的反动，是对一代人青春的扼杀，它本身就是一场罪恶；

有人认为上山下乡耽误了一代人的青春，至今还有着大量的后遗症，许多人受到在正常人生过程中不应有的伤害，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思就是对历史的悔悟。

有人从这代人对社会生产力的作用的角度来谈有悔。一位教授这样说：“有悔无悔要以是否有益于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发展为衡量依据，在这个意义上，当别人突飞猛进地发展生产力，进入爆炸的知识领域，我们却在接受知识无用的再教育，去学习自秦汉以来几乎未加改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而且这不是体验生活，而是被要求扎根的十年呀！说得尖锐一点，这是反生产力方向的。即使在精神方面，除了极少数既得利益者，整个一代人在上山下乡过程中是受到摧残的。如果按照国际上的心理健康标准，这代人的多数在当年多少都会有点心理问题。如果还有人在这两方面的负面作用视而不见，仅仅对在摧残下获取的悟性、砥砺的性格而不悔，我就没有更多可说的了。”

有人从这代人的整体和个体关系，体认历史的角度来谈有悔与无悔。美国著名学者汤本对笔者说：“从整体看，这代人的青春应当有悔。在这场逆境中站起来的成材者毕竟是少数，而虚度年华的、因辍学导致今天丧失竞争能力的、遭到毁灭的是多数。而从体认历史必然的角度，这是已然发生而无可挽回的事情，它产生了经过熬炼的一代青年，又是无悔的。他们的经历都是难得的终身受用的财富。”

再一种意见是，所谓悔与不悔，都是相对于自己的主观而言的，上山下乡对这代人大多数来说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也就没有悔与不悔的问题了。不过，这只是从个人的主观选择上看，而作为一代人十年之久的社会活动，毕竟还有一个反思与否的问题。

◇ 我看知青情结

这场争论的本质，除个别人外，双方并不在于一方对上山下乡充分肯定，另一方完全否定。而在于双方看问题的角度的差异。对于上山下乡的得与失，笔者认为，也许可以把它分成政治运动和实践锻炼两个层次来看待，这样会更贴近历史和人们的感受。

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上山下乡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是必须要否定的，可以说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它的性质是反动的，是在全球人类向国际化、工业化、都市化迅速发展中的一场反历史进化方向的社会大迁徙。首先，其目的是错误的：它是在阶级斗争理论下的反修防修实践；它企图以城乡人口对流来消灭城乡差别；它是以农民来教育知识青年以培养接班人；它是以行政手段的迁徙而不是以发展经济来消灭失业，这些目的性没有一条值得肯定。其次，其客观效果是灾难性的：它使国家承受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损失；它更使广大城镇家庭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它人为造成了社会大面积的、不必要的骨肉分离；它更是耗损掉整整一代城镇知识青年的青春。如果说它还有历史意义的话也是可怜的，如我们在社会发展史中所看到的，人类的文明发展和社会的传承进步，是必然要走一些弯路的。上山下乡这段弯路的最大社会历史功效，就是这代人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活化石，这种化石效应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上山下乡运动仅仅在于它宣示了在当代的社会条件下“此路不通”，从而杜绝了人类社会实验中的这条“理想之路”，足以在世界范围警示后人不再犯同样的错误。（8）在这一层面的认识上，应当说过来人和研究者罕有“青春无悔”的情结，当然不排除今天还有这样的痴迷者，对此笔者也只能无语了。

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作为这代人的上山下乡实践活动，它使知青们在一种特殊的变异状态下，或者说在人生逆境中走向了成熟，并塑造了这代青年一些特殊的品格。就是单单从其正面效应看，它并不足以改变这场运动破坏性的本质。道理在于，不能因为吃苦可以锻炼人们的坚毅性格，就去吃没有什么社会效益的苦，更不要说还强行要整整一代人去吃苦。

部分人的无悔情结是建立在对自己逝去青春的留恋上。他们对曾使自己激动不已的那种革命理想至上的社会氛围，对当年那种解放全人类的胸怀和历史使命感，对所经历的种种苦难和磨练，对自己曾做出的自我牺牲，表现出了一种难以斩断的留恋。总之，这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感动的自恋情结。有人形象地比喻：“我们的上一代可以拍胸脯自豪地说，老子扛过枪；我们这一代也可以拍胸脯自豪地说，老子下过乡。”这样的比拟实在不敢恭维，如果说扛枪的一代自豪，是因为他们在抗击法西斯和争取独立解放的战争中，于历史、于社会、于民族有功。而下乡的一代给社会带来了什么呢？

多数人的无悔情结则建立在对自己曾经生活和成长的第二故乡的留恋上。他们对那段与父老乡亲朝夕相处的淳朴情感，对曾经付出青春和汗水的土地，对自己在那段经历中养成的一些

受用终身的良好品格，以及由虚妄的责任感被扬弃而转化出的、对那块土地和父老乡亲的承诺，所表现出的深切留恋。或许可以把它称之为乡土情结。总之，这是人们心灵深处善良本性的表露和理想主义在这代人血脉中的升华。即使在海外，还经常见到一些老插们在谈到父老乡亲的苦难时而热泪盈眶的场景。而许多老插们今天带着子女回到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有些人还为当地捐献投资帮助发展教育和经济，都是这种知青情结的使然。这是一种正常的、善良的、也是有价值的人生情结，而由于第三代人的特殊发展条件，这种情结成为他们主要的代意识之一。

笔者认为，众多知青的“青春无悔”，其实是自恋和乡土两种情结交织相伴。这两种情结中，如果要做区分的话，前者是不健康的，后者是健康的。如果一个人的“青春无悔”是建立在历史无法改变而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之上，无可厚非。但是作为更多的“青春无悔”者，具体到一个人身上，可能往往二者是融合在一起，难以区分的。这样的“青春无悔”还不能称为“自为”，严格意义上，这代人的知青情结中，其自恋情结所占的成份越多，说明其反思的程度越浅。而且，很多人的这段自恋情结还是与其红卫兵的经历紧密联系的，是对当年那种理想主义的感动和眷恋不舍。这是一种更不健康的自恋情结。本书开篇曾引用了金观涛的一段名言：“我们是一些残存的，然而却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笔者将它改为：“我们是一群残存的、却是不死的，而且是失去了“理想”的理想主义者。”这意味着如果不能对当年理想主义的内核进行扬弃，不能对那个时代的自我进行痛苦的否定之否定，也就无法重建适应于今日社会的新的自我。受“文革”浩劫之害最深的第三代，如果自己还没活明白，何谈国家和民族的反思。

另外，如果把吃苦作为骄傲的资本，而不是以社会效果衡量功过，就会产生不健康的情绪和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标准。“吃苦必须有收益，牺牲一定有价值”，王小波的这两句话是正确的衡量标准，否则不仅不能作为拍胸脯的本钱，反而是负面的作用了。作为已经跨入知天命和耳顺之年的一代人，道理应当是不言自明的。

与此相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对上述问题的种种不同评价，特别在有悔和无悔认识上的分歧，不仅反映了人们认识水平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它取决于人们在今天社会中所得到的地位和利益上的差异。

可以说，上山下乡对这代人的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程度、甚至不同方向的影响。

例如以行业论，今天从事于自然科学工作的老插们，几乎没有人不扼腕叹息那段光阴耽误了自己出成果的机会，相对于下一代人，他们几乎不存在什么在知识积累和专业经验方面的优势，而知识结构、年龄、精力等等使他们已经失去了夺取诺贝尔桂冠的时间。

对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或走上仕途的人来说，这段经历却使他们获益匪浅，为他们今天的工作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社会实践的基础，对国情的洞悉和丰富的阅历就成为他们相对于下一代的优势。恰逢中国正在处于一个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对于前所未有的摸着石头过河，他们的经验是如此地游刃有余，而他们在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中打开的眼界、创新的精神又如此地为社会所需要。

对于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们，那么这段经历更可贵了。无论是早期的朦胧派诗人，伤痕文学或知青文学的作家，电影界的第某代导演，画坛的某某流派等，其多数都是从他们的知青生活开始其艺术生涯的，甚至可以说，他们若缺乏这样的磨难和体验就成为不了艺术家。但是像上面引述某作家、画家和非“普通老百姓”的那几段话，如果作为自己或个人的一点感触也许还能成立，但是放之四海，称“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人”、“应该说是一代幸运人”则会谬之千里。

这里涉及一个原则，对于一个有能力把昔日的苦难变成今日财富的人，他有理由认为自己的青春无悔。他的主观感受可以通过那些大风大浪、痛苦、荒诞的经历得到升华，以丰富人生。但是，对于这代人当中绝大多数凭体力讨生活的老插们，这段经历除了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在他们与其他人的竞争中却是那么的苍白无力，甚至起到的是负作用。如果他们的人生意义和需求，都已经远超出了解决生存和温饱的层次，他们就会主要从追求自身经历和体验的丰富多彩等精神层面去检讨人生了。因此，那些有本事把苦难变为财富的人们，那些有能力把灾难转化成精神享受的人们，切忌去为那些缺乏这种能力的大多数说出“青春无悔”！因为对于芸芸众生而言，最重要的是物质生活的水准，灾难只能就是灾难，穷其一生它也无法转化。

另外，人们今天的经济条件也决定着人们对此问题的态度。

比如说，现在生活条件、经济状况较好的人们，大多不会再计较那段经历蒙受的损失，而容易用宽容的眼光浏览过去。但对于一些至今尚未脱贫的人们，因为工龄或本单位工龄的限制，与那些比自己几乎小一轮的弟妹们拿着相差无几的工资，不能分到按情理来说应当享受的住房，面对着下一代青年纷纷进入大学校门而自己却只能在下班后攻读着各种文凭或补习班，或者完全与现今的各种文凭无缘，他们回首上山下乡的往事时，又怎能不把现状中的这些叹息归咎于斯呢？至于那些在这一过程中遭受离异之苦、伤残之痛、变态婚姻的折磨，以及因此受限终身失去遇到知音机会的男女们，上山下乡简直是一场噩梦。

伴随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作为政治运动无疑是要被彻底否定的。但它作为第三代人的一次整体实践活动，毕竟给这个社会、给他们自身留下了些东西，其褒贬毁誉自然应当是历史学家的事情。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这些不同认识注定要通过这代人强烈地表现出来，不管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符合于时代发展潮流的抑或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因为它留给这代人的痕迹太深了。

大约是1995年夏天，笔者曾经应邀参加一个由《光明日报》和《北京青年报》举办的关于老三届的座谈会，恰好与已故作家王小波同席。英年早逝的王小波是一位很有潜力成为文豪级的小说家和杂文家，当然也是一位第三代人，有幸还是比笔者晚一届的校友。因为对他不熟悉，也许是他的口头表达远逊于他的笔头，总之他在那次会上的发言并没有引起笔者过多的注意。而开始熟悉他〔9〕，是他故去后出版的系列作品，特别是其颇有思想深度的杂文。其中就有几篇论及了这里谈论的主题——青春无悔还是有悔的问题，这里摘引几段，也表示对他的一点追思。

王小波的文章指出：

上山下乡是件大坏事，对我们全体老三届来说，它还是一场飞来的横祸。当然，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举例来说，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但整个事件的性质却不可因此混淆。我们知道，有些盲人眼睛并没有坏，是脑子里的病，假如脑袋受到重击就可能复明。假设有这样一位盲人扶杖爬上楼梯，有个不良少年为了满足自己无聊的幽默感，把他一脚踢了下去，这位盲人因此复了明，但盲人滚下楼梯依然是件惨痛的事。尤其是踢盲人下楼者当然是个下流胚子，绝不能因为该盲人复明就被看成是好人。……那种坏事可以变好事，好事也可以变坏事的说法，它来源于伟人，在伟大的头脑里是好的，但到了寻常人的头脑里就不起好作用，又是弄得人好赖不知，香臭不知。（10）

……很多中年人因为“文革”中上山下乡虚耗了青春，这本是种巨大的痛苦；但他们却觉得很幸福，还说：“青春无悔”。

我认为七十年代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看法和一些同龄人是一样的。七十年代的青年和现在的青年很不一样，更热情、更单纯、更守纪律、对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加倒霉。

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是一种极难得的际遇，这些感受和别人是一样的。有些人认为这种经历是一种崇高的感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病态的。让我们像奥威尔一样，想想什么是一加一等于二，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极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种牺牲毫无价值。想清楚了这些事，我们再来谈谈崇高的问题。就七十年代这个例子来说，我认为崇高有两种：一种是当时的崇高，领导上号召我们到农村去吃苦，说这是一种光荣。还有一种崇高是现在的崇高，忍受了这些痛苦、做出了自我牺牲之后，我们自己觉得这是崇高的。我觉得这后一种崇高比较容易讲清楚。弗洛伊德对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释：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自己好过一些。对这个道理稍加推广，就会想到：人是一种会自己骗自己的动物。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种经历是崇高的。这种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过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还有些坏作用：有些人就据此认为，人必须吃一些无益的苦、虚掷一些年华，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崇高。这种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有病。

（11）

王小波的观点或许可以这样归纳一下：一、要彻底否定上山下乡，反对青春无悔的提法；二、这代知青从上山下乡的特殊经历获取的收益，是从属的，次要的，不能改变整个事件的性质；三、把吃了许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当成崇高的感受，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表现。希望没有理解错他的意思。

另一位同代人这样看：对于“青春无悔”我有些格格不入，同时又感到它是值得理解的。这可能是一种自然流露出来的“找齐”心理：像老红军回忆长征，老八路回忆抗日战争，老志愿军回想抗美援朝。可是我们的青春却没有办法和他们任何一代人“找齐”，我们只有上山下乡。找的意义，实际是更大的失落，是无情地显示了自己的“老”和“过气”，所以这个模式里隐藏了一个悖论。和老红军们不一样，我们的价值在于是否对环境进行了抗争？最有价值的青春应当是这样的：别人和环境一样，你不一样；同样的环境，会出不同的人。如果你成功了，不要感谢苦难，而要感谢你自己以及曾经帮助你战胜逆境的人，悔与不悔的分界线在于你当时有没有顽强地抗争愚昧与沉沦？你今天是不是清醒地确定了自我认识与外界评价的关系？（12）

关于青春有悔还是青春无悔的问题，是在这一代人中曾引发广泛争论的一个问题，至今也同样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笔者希望通过上述的定义、概述和总结，对人们认识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帮助。笔者以为，这个问题反映的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即人们究竟有没有对文革那段历史进行过认真的反思，所以它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自我反思的命题。另外，它还是一个概念并不明晰的命题。因此，在提出赞同还是反对“青春无悔”之前，首先应当明确其概念，即上山下乡运动的内容是什么，否则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的争议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最后，笔者认为，作为一个个人，青春的意义实质并不在于有悔还是无悔，而在于是否做到了无愧。

注释：

（1）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244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说句题外话，这笔钱账是算在知青身上，但钱绝不是都花在知青身上的，类似于历来统计中的扶贫款。

（2）据统计，1965年全国在校各类学生13125万人，由于“文革”全部停课失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文献与研究》，第5卷，第276—27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

（3）晓剑、郭小东：《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第43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 (4) 晓剑、郭小东：《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第51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 (5) 钟岩：《中国的新三级学人》，第23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 (6) 晓剑、郭小东：《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第39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 (7) 刘亚秋：“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
- (8) 请读者注意，这一结论，是建立在“上山下乡运动”作为文革中出现的政治性运动的定义之上的，详见笔者拙文《论上山下乡运动的缘起》，并非广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 (9)(10) 王小波：“我看老三届”，《王小波文存》，第326—32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 (11) 王小波：“人性的逆转”，同上，第295—296页。
- (12) 钟岩：《中国新三级学人》，第15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 本文根据米鹤都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有关章节改编

【文艺评论】

白没白活的青青岁月——看电视剧《知青》

• 黄纪苏 •

无论是一个人、一群人、还是一代人，都需要生命的意义感，都需要确定自己没白活，但现在没白活，过去也没白活。对于那些“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如瑞士、新西兰，生命的三世浑然一体，意义前接后续，平顺得像月下缓缓流淌的春江或纺织能手指间的绸缎。而数经沧海桑田、今是昨非的现代中国，生命意义的断裂有时甚至高位截瘫，这造成了从20后到60后几代人所共有的内心紧张。梁晓声创作的45集电视连续剧《知青》，一如他以往同类题材的作品，可以说是这种紧张的产物。

知识青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始于文革由盛转衰的1968年底。那一年，文化大革命陷入了泥潭：造反派把当权派打倒在地之后，彼此间的大打出手向着真枪实弹步步升级，清亡后近四十年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的局面隐然再现。对此，毛泽东从最大的造反派泫然转身为最大的当权派，派出了军队这个尚未被“砸烂”的国家机器去恢复国家秩序。而曾经被赋予“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重任的造反青年，也随之变身为“知识青年”，前往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我当时还上小学，印象中他们是喊着口号唱着歌去的，有些甚至是争先恐后去的。总之，音高还是与文革相始终的 high C，色调，还是毛时代一贯的红光亮。但下场，已冷冷等在远方。过程，则像老山来的灵车，静静走在路上。

我大致按时间先后，说说我个人生命中的知青：

- 1968年底的一个寒冷早晨送二姐登上去内蒙的火车，北京站站台上的知青家属哭声一片。

- 不久院里的大Q也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他母亲眼圈红红的，逢人就说没头没尾的“刚刚十六岁”。

- 我们小学所在胡同的一家门口又是喜报又是红花又是敲锣打鼓，听说那家的孩子没去插队，不知什么人使用轰麻雀的方法轰他。

- 又过了一两年，我四姐也是被街道连催带赶去了农村，家里也没办法。临去之前她一声不吭在地上蹲了两三天，把家里的沙发拆开，把几十个弹簧重新绑了一遍。

- 70年代初，二姐从农村招工去包头的工厂，急需父亲单位的证明信，父亲一刻不敢耽搁，深夜出门奔走此事，四十年前屋外的雨声此刻犹在耳边。

• 院里还有位老高二知青叫二 T，也在东北兵团。二 T 太想脱离黑土地了，每次回京探亲不是咿咿的拉胡琴就是砰砰的弹月琴，还手持一卷苏联人写的戏剧原理，叨叨着“悬念，关键是悬念”进行剧本创作。他那出剧讲的是知青遭遇洪水、抢收粮食，我还记得他朗读的结尾：“魏江高举红旗，众人造型，咔嚓一道闪电，剧终”。二 T 终于进了师文艺宣传队，不用在地里抢收抢种粮食了。

• 大 Q 的弟弟小 Q 肝炎痊愈不久，为把哥哥办回北京，根据秘密流传的配方，喝了一整瓶葡萄酒加半斤白糖，第二天冒名顶替去医院查肝功。

• 我则因为肝病迁延，也被人包括高中老师神秘秘请去，帮他们插队的亲人抽血，当时颇觉自己成了人物。

• 小 Q 的小屋里，墙上挂着张毛主席像，已搬走的老邻居老 D 有回进来，说着说着话，便扑上去将像扯下撕烂。老 D 是老高三，在河北插队，当年首都中学红卫兵在工人体育馆开大会时他坐在主席台上，根本听不见几个同院小兄弟的欢呼。他姨夫是 27 年的老党员，科学院的所长，老在院里来回散步，我听说他是“心里学家”后便问他我心里正想什么，他说“正想淘气”，这让我至今对心理学不看好。那么和蔼的一个人文革中被折腾死了。

• 大概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 74、75 年，远远看见二 T 戴着长毛帽子、蹬着大头靴、斜背军挎、手拎旅行包走进胡同，满脸的春色，浑身的春意。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特别富有戏剧悬念：“一步登天哪！”原来北京的中学为解决师资不足，专门从兵团招回一批老高中知青，他这回不但离土而且离乡——套个今天的学术句型即：完全“去”上山下乡化了。

• 北京市政府 80 年代末出台一项政策，允许所有在外地的知青偕同他们的家眷回京定居，我二姐一家就是那次办回来的。书本里早读到的“仁政”一词，这是头回跟书本外对上了号。

这些知青当然代表不了所有知青，但能代表知青运动的基本走势。上山下乡有多大意义、算不算白活的问题，对于当年的千万知青、亿万亲友，答案是越来越否定的。个体局部的逃逸终于随文革的落幕而演变为整体性的溃散，正如《知青》最后一集最后一幕老站长对梁支书所发的感慨：“都走了，来的时候热热闹闹，走的时候乱七八糟。”知青运动与文革虽不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差不多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样一种联系，对日后更理性地理解上山下乡，更全面地再现那段历史，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上山下乡运动所处的环境，其实不仅仅是文革十年，还有毛时代三十年，甚至更广大的社会历史时空。当年，“上面”如上海、北京及各大城市畅通无阻的一套，到了制度走样、文化别样的“下面”尤其偏远乡村，就要打折扣，有时对折，三折两折的也不是没有。于是，一个与口号社论新闻简报颇不一样的中国，便对知青，并通过知青们口头版的现代《山海经》《录异记》对更多的城市人群，产生深深的震撼，为日后中国的社会巨变积蓄了情感或情绪的能量。《知青》对这个“别样中国”有所反映，只是相对于四十五集的鸿篇巨制，它所反映的太嫌单一了，基本就是“文革凶残与人民（或人性）善良”的二重唱。就说知青跟当地群众干部的关系吧，不是知青帮群众致富，就是干部对知青呵护有加，虽然不乏感人的细节，但显得重复堆砌。只有泪眼而没有冷眼，就会缺少力度，流于滥情。梁晓声是一位富于文学情怀和社会关怀的作家，但他并没有修得大时代文艺家应有的历史理性。他繁盛的情感由于缺少带队的又怕走丢了，于是在中国现当代迷茫的天色里、错综的变局中拥拥挤挤挤作一团。就认识价值而言，这部《知青》仍在《今夜有暴风雪》《年轮》起步的地方踏步。说它是一部 80 年代初的作品，写完锁抽屉里钥匙就丢了，似不为过。但平心而论，八十年代的不少作品是有生命感的，与眼下年轻枪手们一边收发黄色短信一边“创作”出来的“怀旧”电视剧不可同日而语。

这部剧的生命感，主要体现于生命意义的断裂所造成的内心紧张。这紧张不仅属于梁晓声一人，也属于那一代知青，甚至还属于经历了三十年河东又三十年河西的无数中国人。当然，就广大知青而言，其紧张的程度、方面、甚至方向，都会因他们当年不同的经历以及日后不同的命运而各式各样。对于后来混成大官、大款或大腕的当年知青，这种紧张即便有也不大，“天

降大任”的今生完美地整合了吃苦受累的前世。八年底层和十年寒窗异曲同工，不就是块磨刀石嘛。如今磨刀石安卧在紫檀座上，陈放在法兰西风的客厅里，不但可以昭示儿孙宝剑锋是怎么来的，还能让众宾客对宝剑心悦诚服：中国就该由这样的宝剑指挥，蛋糕就该由这样的宝剑切分呀。其中年轻的女宾在珠光与剑气的交相辉映下目眩神迷，割指血沿血槽写英文血书的心都动了。

而那些在当年上山下乡誓师大会就轮不上他们发言、如今依旧默默无闻的广大知青呢？他们少小离家，一脸褶子、拖家带口回到城市，在学历低、工作差、住房挤的人生陋巷里磕磕碰碰，腿脚微近中年，心气已入暮年——单位里数他们光干活不折腾。在新时代的价值 / 意义一览表上，凡是上星的如学位、梯队、出国都跟他们不挨。而他们曾经富有的泥土、汗水、还有满手的老茧，都跟满洲国纸币似的没处花也没处扔。当年曾听到一些回城知青低声的叹息：“要不是为下一代，回来干嘛呀”。他们的人生，从下乡到下岗，像只流浪的黑猫，夜里一片黑，白天属它黑。我近年翻阅过这类知青再聚首后精心制作的纪念册，有当年的照片，还有如今的感言，从那些感言里可以强烈感受到他们对人生意义的渴望，对那段岁月的珍视——其中“战天斗地”“广阔天地”之类文革语言或疑似文革语言随处可见。这样的感言或感受跟词汇量没多大关系，跟喜不喜欢文革没多大关系，跟毛主席让他们上山下乡到底安的什么心也没多大关系。既然当年披星戴月割麦插禾并没真发生在铁丝网里，那他们回首当年，干嘛非照别人的意思把自己看成劳改犯呢？其实，能出席插队同学、兵团战友聚会的，还不是如今混得最惨的。混得最惨的那些人怎么看那段人生，我们无从知道，因为他们什么也不说。也许他们什么也不想，今生已剥夺了他们述说、思考前世的兴趣或能力——也许。

知青毕竟年轻，社会巨变就算没给一些知青优待，但总还给了他们时间。岁数大的另一些人，就算得到了优待却没得到时间。就说沈从文先生吧，中年时由民国入共和国，180度的大转型几乎把他转疯了（最近读书，发现那一代学者文人光我知道的就颇有几位得了间歇性精神病）。好不容易到文革结束前夕转型完成：他积极争取入党，请思想落伍的老友站远点，别干扰了自己的进步——基本上脱胎换骨了。但接下来天旋地转，180度又转了回去。在转回去的天地里，沈老前面的四十年算生活，后面的三十年算白活。沈老本来就是“民国范儿”，按说重操旧业总比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民国迷要靠谱得多。无奈余下的时间扒层皮还够，再脱胎换骨就不够了——李慎之那一代才有机会从“一头沉”走到“两头真”。据说沈老暮年一再说他“无话可说”，看着不但白活而且还白费了半生劲的后半生，他确实没什么好说的了。类似的情况在老辈文人中并不少见。文怀沙先生属于极端的特例，他太能活了，漫长的岁月加上必要的资源，使此老在望百之年竟然活出了芙蓉姐姐的时代风采。为数更多的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老人，既没得到优待也没得到时间。过去单位里有位同事，是个勤勤恳恳低声细语的老太太，年轻时评职称时兴先人后己她就让了，老来时兴先己后人没人让她，反说她职称格外低正说明水平特别差。她无奈地摇摇头，退休回家了。1980年代这样的人很多，当时就没人关注，如今已没人记得。

《知青》在舆论界遭到的恶评集中在“赞美苦难”，“美化文革”，向即将接管中国而又有着知青经历的领导人献媚，属于政治投机。是不是想“献媚”只有梁晓声自己知道，而我们只知道他80年代就开始创作这类作品了。投机的典型特征是见风使舵短期行为，像梁晓声这样几十年风雨无阻蹲一地方，跟傻老婆等汉子似的，说“投机”就不合适了。“美化文革”的说法也需要分析。首先主观上，梁晓声确实是想通过这部剧痛批一回文革（见他最近的博客文章）。可能是因为批判的心情过于急切，没顾上艺术规律，他塑造的吴敏和牛川河这两位代表文革路线的反面人物，就像光用锯子没用凿子刀子弄出来的木俑，艺术上恐怕说“次品”都高了。再有，一般发生在社会结构五楼六楼如“两校”“两报一刊”那类地方的情况，作者非塞一楼甚至地下室的陕北穷山沟里，就太牵强附会了。相对于反面人物塑造的失败，那些相爱相助的正面人物倒都还有血有肉，看着像那么回事。这就使得这部剧，在客观上，真有点儿把文革控诉会开成

文革表彰会了。顺带说一下，文革特别是文革后期的文艺舞台上，一直是反面人物生香活色，正面人物直眉楞眼。《知青》则反了过来。其实说反也不反：文革作品中的正、反人物，随大时代的转身，成了《知青》中的反、正人物，如此而已。

最后，关于“赞美苦难”，我在前面已从社会变迁与生命意义的角度说了不少，这里再说几句。第一，“上山下乡”是一个巨大而动态的集合体，既包括了数千万知青当年即不乏个体差异的经历及感受，又合并了他们后来分化更剧的心与境，不是哪个人、哪本书、哪首歌、哪部剧、哪份文件、哪派史观、哪股思潮可以一统江湖的。说你自己的，也让别人说别人的吧。第二，知识分子，如果还好意思这么叫的话，看待事物应该多点分析，少点打包，别脑门上都七沟八梁了，脑子里却总一根筋：好就都好，坏就全坏。对文革、对毛时代、对知青运动，应改一改满门抄斩的老习惯了。一段历史，哪怕仅仅是为了不让它重演，也需要在了解它有哪些害处的同时，也了解它还有哪些长处哪些道理，否则你根本不知道它为什么能发生。不知道为什么发生的历史，你如何防止它再一次发生呢？从建设的角度说，全盘否定也不可取。在这方面，知识分子应该向拆迁工地上没啥知识的农民工和包工头学习：大凡能用的钢筋砖瓦、能卖的窗框门梁，他们一件没落下，全装车拉走了。“全盘否定”有位同父异母兄弟“全盘肯定”，那天我在一个会上听一位老大不小的先生天花乱坠地夸文革，听着跟童声独唱似的。他就不想想，文革要真好成那样，怎么就破产了呢？

理性辩证是对知识分子的期望。我们期望于社会管理者的，则是让各种声音都有发出的机会。对《知青》和知青运动是这样，其他事情也是这样。

□ 原载于《凤凰周刊》2012—7

~~~~~

#### 【学者访谈】

不要因自己的怀念，就歪曲上山下乡运动的事实

• 潘鸣啸 •

〔1〕 乌托邦——语境

晨报周刊：您关于知青的研究著作名为《失落的一代》，但是内地版封面却用了一张宣教意味甚浓的插画——《农大新学员》（人民美术出版社，1974）。这里是不是在暗示着，关于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一直有两种语境在表达——一种是官方语境，一种是民间语境？这两种语境各自依附的逻辑是什么？还是说这样的划分也是绝对化了，民间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也经常是五味杂陈众说纷纭？

潘鸣啸：我是特意追求书名和封面图反差的效果，法文版和香港版封面也是如此。上山下乡（特别是1968年后）是主要由毛泽东发起的一个政治运动。当时，这个运动的语境和形象完全被官方宣传笼罩，不能出现别的语境。所以，我们现在回顾这个运动大多只能采用当时的图像和口号，而恰恰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官方想给这个运动怎样的目标和意义。但是，如果我们要反思和研究上山下乡，我们不得不面对它的实际后果，包括这个运动催生了“特殊的一代”。至于现在回忆这个运动，有哪些说法和遵循什么逻辑，这总结起来比较复杂。官方在大众媒体上还是用相对肯定的语境，但是在学术角度允许有些批评意见（要不然，我的书不会有大陆版）。而民间的回忆则是五味杂陈，争辩很多，有时甚至很激烈。基本上持两种态度：怀旧的态度（明显地还受当时宣传影响的态度，但是它的动机是怀念青春和强调自己经历的价值，不一定是肯定这个运动在历史上的价值），及对这个运动批评和怨怼的态度，持这种态度的

人强调上山下乡对国家的不利以及对知青个人有害。

晨报周刊：对于文革的总体评价国人已有基本共识，起码在文艺作品中不太可能出现为文革唱赞歌的情形，但是对于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对于知青，社会上貌似还有一种浪漫情怀，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都会出现知青的角色，且往往会演变成爱情故事，比如张艺谋拍摄的《山楂树之恋》。这是不是一种类似于认知紊乱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潘鸣啸：确切地讲，《山楂树之恋》不是一个知青故事，只是把一个爱情故事放在知青上山下乡的背景下。这个故事与中国70年代乡下的实际生活基本没有关系，不过是一个浪漫的“Love Story”让人哭一下，再顺便赚一大笔钱。当然，我不是说当时就没有美丽的爱情故事，但确实对知青来说如何面对爱情和性欲是个大问题。很多人美好的感情最后却被残酷的环境歪曲了，或受到挫折与打击。主要是因为下乡后知青很快就只想一件事：怎么回城。而结婚会影响回城的机会。即使不结婚，互相相爱的两个知青，如果突然其中一个有机会回城，另一个没有，如何选择是个难题。另一方面，不少女知青在当地也受各种各样的性骚扰甚至强奸，有很多悲剧发生。但在国内，很多问题不能当电影的题材。另一方面，五六十岁的人会有一种怀念青春的情结，所以他们宁愿忘记痛苦，用粉色眼镜来看过去。当然，比起更残酷的无意义互斗的红卫兵经历，知青生活提供了更值得怀念的面目，比方说知青在艰苦环境中的互相帮助、互相信任的气氛。后来，这种哥们儿的感情对他们成立各种各样的联谊会、网站等组织起了重要的作用。

晨报周刊：仅仅在形式上，可不可以说上山下乡运动暗合了某种理想主义？就像您在《失落的一代》里所写的，“社会上存在着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是怀着个人需要及抱负乃至群体利益的不同人士，都想多少掌握一点自己的命运，能为社会尽一分力。当他们愿意参加一场伟大的全民事业时，无疑可以发挥利他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当时海外很多左派青年效仿上山下乡运动是否也是因为这一点？您参加过法国1968五月风暴，在1970年代的香港第一次亲眼见到中国老知青听到他们的故事之前，您对上山下乡运动是否也有迷思？这种迷思又是如何一步步矫正过来的？

潘鸣啸：当时，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中学生和大学生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我们很想和“无产阶级”相结合。有一部分学生是直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但不是多数。可是反正都崇拜无产阶级。我们“解放”了索邦大学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请工人进大学和学生对话。当然，在法国，我们不会请农民，他们在马克思著作里面和在欧洲的实际情况里都算是比较保守的力量。可是大概1969年，当知道了中国有一个上山下乡运动，我觉得很好（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只看过《中国画报》一些宣传照片）。可后来，我慢慢对毛泽东开始有些怀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觉得对毛的个人崇拜是一个问题。1971年9月，我刚到香港，就听到林彪事件的消息。那时，我开始觉得整个制度有问题。但我还是认为和工农兵相结合是值得佩服的理想。只是1973年，偶尔认识了一批偷渡出来的广东知青，我跟他们聊天，才开始了解真相，知道他们并非自愿，而当地农民基本上也觉得他们是个负担，等等。后来，在和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很多上山下乡的具体情况，感到他们的经历很特别，非常有意思。后来，我对他们进行了访谈，并合作在法国出了书《20岁在中国农村》。

晨报周刊：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与1967年法国发生的“插入运动”及1970年代初期发生的下乡定居运动有哪些根本上的不同？

潘鸣啸：最主要的不同就是法国的“插入者”和“下乡者”都是自愿的，他们一直都有自由选择生活道路的权利。但是即使如此，他们过了几年后，大部分都放弃了“与工农相结合”的目标，因为他们认为没法实现原来的理想。对一些人来说，这个理想、信仰和现实的冲突以

及认知过程中的矛盾和纠结，非常痛苦。我知道有一个“毛派领袖”，他甚至参加了那一批法国大学生在1967年到北京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代表团。他自从理想破灭后就拒绝说话，到现在也不说。他的女儿写了一本书讲这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 （2） 失落的一代——后来

晨报周刊：在《失落的一代》的自序部分，您写道：“我将知青一代称作‘失落的一代’，这一称呼可能会引致属于这一代的某些人不解、不快甚或反感。应该强调这里非没有任何贬意，相反还是相当贴切的”。为什么会忧虑这会导致某些人反感？

潘鸣啸：我用“失落的一代”这个说法是中性的，不含贬义，只是想强调这个运动让知青们失去很多小时候的信仰和学到的价值观，也让他们的大部分人失去受好教育的机会。可是，这本书2009年初在香港出版后，很快在国内的网上能买复印本，四个月以后，也已经有盗版本，在知青中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后来在网上就开始有一些评论，大部分是赞成的，但是有一些人表示对书名的反感。后来大陆的出版社也曾“谨慎建议”我修改书名，但我还是坚持用这个书名。但同时，我非常不希望知青认为用“失落的一代”是瞧不起他们，认为他们“堕落”，或者以为他们的经历没有什么积极价值。所以在大陆版本序言里特别解释了这个问题。

晨报周刊：《失落的一代》研究的时间段是1968—1980，知青返城之后到现在已基本成为社会主流、精英。《中国改革》采访您时提到华东师大的许纪霖教授有一个观点，认为知青这一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有很矛盾的东西，既理想又现实，与体制也有很奇特的关系，从批判到合谋。我采访过一位作家，他也有类似表达。是不是在理想主义破灭之后，在现实面前摔打过之后，一些特别投机的、现实的东西会冒出来？法国1968一代的日后走向与中国知青的命运转折有何异同呢？

潘鸣啸：不要忘记后来变成“精英”的那些人只是知青群体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人受了负面影响，如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一辈子留在社会的最低层，做着简单的工作，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90年代下岗了。可是，如果谈知青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当然比较优秀，因为他们先有了一个实际社会经历，后来因恢复高考时他们成绩特别好就能上大学，在大学也因为渴望了这个机会很久所以特别用功。作为曾经有过理想的人，虽然这个理想基本上破灭，但是他们会怀念理想，不是什么具体的理想（他们看透了它的半乌托邦半虚伪的性质），但是他们怀念理想本身。所以，他们的理性让他们特别现实，特别反感空想，但他们的怀念情结让他们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新的道路。我觉得也有另一个因素，就是当局没有允许整个社会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有一个比较彻底的反思。在这样的情况下，连在知识界里面还有很多模糊的概念。在这方面，我们“68年人”的情况不同，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有这种许纪霖教授谈到的矛盾。大概是因为对理想还是感到一种怀念和盼望。

晨报周刊：您研究过知青文学，比如张抗抗、梁晓声、叶辛等作家的小说，您曾评价说他们是写实主义的，您觉得是有意义的。那您能理解梁晓声会编出被很多知青批评虚假的电视剧《知青》么？您怎么理解梁晓声的这种转变或《知青》引起的论争？

潘鸣啸：我已多年没有和梁晓声联系过。我对他80年代的小说有比较高的评价。我也相信他是一个诚恳的人。我只看了大概三集《知青》电视剧，但是我觉得不如他三十多年前的著作。最近也看到他也是“亲笔抄写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一页”的一百个作家之一。所以，我的感觉是他没有能够超越年轻时的认识和感受，他与那个时代没有反思的距离。现在的社会变得很快，不往前走，很容易就落伍了。我现在比较喜欢看一些有距离，有幽默感的知青文学，比如王小波的小说，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鱼挂到臭，猫叫到瘦》（更的的作）。

晨报周刊：与红卫兵在文革后大部分都对往事讳莫如深不同，中国知青大都对下乡生涯并不忌讳，因为共同的记忆和体验，他们常常按照下乡插队的地域形成各自的知青组织，回忆往昔岁月或者几十年后再下乡进行一些帮扶活动。您怎么理解他们的心理变化？

潘鸣啸：我有个亲戚在二战中当了俘虏，被派到德国军队控制的波兰农场集中营。我小时候总是吃惊地看到他那么喜欢回忆这个时期，并且组织以前的难友每几年都回到这个波兰的农场。我觉得知青的怀念是同一个道理。虽然，他们当时非常想离开农村，但是回到城市后，面对各类问题和烦恼，他们怀念自己青春，也怀念当时的哥们儿人情。对那些后来一直找不到让他们满意的社会地位的人，这种共同的怀念特别有价值。而对后来混得很不错的人，这个记忆也有价值。他们觉得通过这个艰苦锻炼，他们找到了自己成功的道路。对一些人来说，也可以说这个经历是一个“象征性的资本”（布迪厄），甚至是政治资本。我自己觉得知青强调他们在这个运动里得到的一些有价值的教训很正常。但是要分开主观和客观。不要因为自己的怀念，就歪曲这个历史事件的事实和意义。客观上，这个运动是一个巨大的失败和庞大的浪费。不能作为未来的政策模式。

### （3） 遗产—影响

晨报周刊：您在《失落的一代》的扉页引用了舒婷的诗——《一代人的呼声》，您说您所推崇的知青精神就是舒婷在她的诗作中所表达出来的。可以再详细解释一下么？这种知青精神，直到现在，依然在影响中国么？还是越来越稀薄？

潘鸣啸：通过我和知青朋友的谈话，我发现他们在乡下的时候对小时候学到的意识形态开始产生怀疑。后来，他们不再随便相信官方的口号。他们变得实事求是，也有一部分人开始反思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他们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来辨别是非。他们也反思了文革，后来在70年代末就支持改革，以及当时官方强调的“民主与法制”概念。有一部分人也参加了“民主墙运动”。我觉得舒婷的这一首诗代表这个概念：康德所讲的启蒙性质，即用自己的脑袋反思，不再做未成年人听大人的话。而且，这首诗的题目是“一代人的呼声”，意思是这不只是她个人的盼望，而是有意代表整个群体。当然，不能说是代表整个群体。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两面的：一方面有人已经忘记了这个精神，他们大部分只关心自己，想改善自己的生活，找赚钱和升级的办法，但另一方面，还是有人坚持当时的精神，而更重要的是，虽然大部分人已经不谈这些，不做系统的反思，但是他们脑子里已经吸收了当时那些民主与法制的概念。这在青年一代比较明显。

晨报周刊：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趣大么？您在与现在的中国青年沟通时，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如何？会否常有相同的误解？

潘鸣啸：我没有做有代表性的调查。可是，这两年我做了不少有关《失落的一代》的演讲，每一次发现听众有一半左右是年轻人。后来知道了很多是知青的孩子。所以现在我很想了解这个运动对下一代的影响。在我的微博上，也发现年轻人对这个题目感兴趣。但是很难说他们有什么评价，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少，所以希望有人可以比较客观和全面地讲这个题目。这当然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当代史都是这样。只是，那些有知青父母的年轻人特别想了解这段历史。

晨报周刊：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和法国都出现了青年运动浪潮，对于那场发生于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法国人是如何整理及发掘这份遗产的？他们又如何向下一代讲述当年的青春往事？

潘鸣啸：五月风暴一方面在政治上失败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法国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它对当时的社会（教育、男女关系、上层和下层关系、伦理概念等）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影响。运动以后基本上来不及反省，因为当时我们这一代还是要往前看，考虑怎么实行世界革命之类的。但是在70年代末就开始反思自己的经历。一方面是因为年龄的问题，一方面是已经对“实际的共产主义”，对革命有彻底的失望和怀疑。后来，有了很多辩论。有人自豪参加“风暴”，有人赞成它的后果，但也有人批评，甚至觉得现在法国大部分的社会问题都是“68年人”的错。上一届的法国总统是其中之一。但这证明到现在这都引起法国人的兴趣。所以，有人现在觉得够了，不要再讲这个问题。当时最有名的学生领袖几年前写了一本书叫做《Forget 68》（忘却68年）。

晨报周刊：您觉得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留给中国或现在的年轻人的遗产是什么？要整理和发掘这份遗产，就您所知，现在有哪些项目在做，还有哪些实际的工作要做？

潘鸣啸：这个运动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涉及到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很多方面。而且，大部分参加者还在，所以我觉得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应该多研究当时的情况，比如一些政策的动机，在各个阶段经济顾虑和政治目标的关系，也应该研究回城后知青的命运，他们所成立的组织等，还有那些到现在在生活上困难的知青，等等。在中国和外国都有学者做这些，而且最近好像不少年轻学者也写有关这个题目的博士论文。可是，都比较分散，所以我年底要在香港开一个国际演讲会专门讲上山下乡，希望能促进这方面的研究。

□ 原载《晨报周刊》228期

~~~~~

【往事非烟】

当年贫下中农是这样“再教育”我们的

• 唐 燕 •

一

我1968年9月到内蒙农区土默川插队。

我们村是个主要由三大家族25户人家组成的小村。一个大家族是李姓蒙族；另外两个是汉族，分别姓何和高，是明清时期从山西移民过来的。

当时村里总共200来口人中，只有三位有初小文化，其中两位当了队里的会计，还一位在村小学10来个娃娃组成的复式班里当个混事的老师。此外，还有一位是曾在山东搞美术的被发配来的右派，姓禄。其余全是“睁眼瞎”。

下乡不几天，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极令人震惊的“现行反革命”现象：男老乡统统用毛著纸卷烟抽，女老乡则纷纷用毛著纸剪鞋样。这些用珍贵的圣经纸印刷的上百本毛著据说是不久前“城里人送来的”，他们理直气壮地反问我们：“俺们不识字，哪看得懂？”

在短时间即对我们解除了戒心后，他们说：“林彪是个奸臣，周总理才是忠臣。毛主席这回看错人了，要倒霉。”还问我们：“毛主席的军师是谁？”我们觉得这些贫下中农不仅真反动真落后，还真可笑，“毛主席那么伟大，哪有，哪用得着什么军师，你们古戏看多了吧？”

三年后的九·一三事件使我们目瞪口呆，对他们刮目相看。

可是在林彪当年到底是蒙冤还是叛逃仍然令人不解的今天，他们是对还是错？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其先知先觉从何而来？难道真是源自听古戏？

二

说起看戏，那个年代当然绝对没有什么古戏可看。偶尔旗里的晋剧团下乡巡回演出样板戏，我们那个小穷村也请不起，只能早早吃过晚饭徒步到请得起剧团的临近大村去看。站着看完先知剧情的样板戏后返回时，还得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伸手不见五指的10来里夜路，很是辛苦。

其实，老乡们更愿意农闲时聚集在老张那里吹拉弹唱。老张是我们村唯一的五保户，五十来岁，个子不高，眉清目秀，相对白净的脸上从不长胡须。他跟高家何家都不沾亲带故，他无妻无子无家，但也无病无灾，却被村民们心甘情愿地养着。后来我们被告知他曾是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一点儿农活都不会干的戏子，他的住处竟然是村里没有文化的村民们向往的“文化娱乐中心”。

虽然我们对晋剧，山西梆子之类从未接触过，起初对他们的唱词也听不懂，但在连一张报纸都没有的文化沙漠里，那时而高亢时而幽怨的苍凉曲调不能不渐渐吸引了我们。他们唱的都是旧曲儿，唱得最多的是我们当时一无所知的《走西口》。那首著名的民歌道出了当初移民潮中一对山西小夫妻生离死别的不舍和悲苦：“哥哥你走西口，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走西口》歌词其实版本繁多，他们唱的多属黄段子。一开始，特别是在我们女知青面前他们还有所避讳，后来则毫无顾忌，每每都唱得如醉如痴。

我们的性知识也正是通过这些黄段子，加上不时看到城里不得见的猪马牛羊交配，当然还有老乡们或真实或开玩笑时常常挂在嘴边骂人的脏话，才得以启蒙的。

我们那里村村都有不少娶不起媳妇的光棍，兄弟俩或明或暗地娶一个媳妇；某个光棍借别人的老婆生了个自己的孩子，从而有了后代的事时有发生。这当然不符合婚姻法，但面对老无所依的农村现实，我们对各类光棍们充满了同情。

我们邻村一个老初二的女知青（崔XX，当年只有17岁），下乡没多久就在一天傍晚，当她独自走在村路时，被一个色狼拖到旁边的庄稼地里强奸了。可怜她当时毫无性知识，更不懂得性防范，只以为对方是想要她的命。当她踉踉跄跄回到知青点，哭了好久才终于无比屈辱悲愤，无比羞耻半遮半掩地告诉同伴们后，那些同样是性盲的同学们最终也没完全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来这事被上报到旗里。可是由于当时事发得太突如其来，她受到太大的惊吓，加上天色已黑，她竟不知那色狼长什么模样！她的精神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极大的刺激和摧残，后来被病退回北京。

我们从小性知识，性防范教育的缺失，竟是通过这些方式被贫下中农“再教育”了。

三

忆苦思甜是我们初下乡时再教育的必修课。当贫下中农声泪俱下地给我们忆苦时，竟控诉的是大跃进时饿肚子之苦。

我们问：“难道大跃进时比解放前还苦吗？”

他们说：“解放前饭总是能吃饱的。”

“给我们讲讲解放前吧！”

“解放前不饿肚子，地主对长工，短工也都仁义。就是土匪闹得凶，从大青山下来的土匪可灰（坏的意思）了，半夜三更闯进屋，什么都抢，连枕头都不给留下一个。”

“他们不是只抢富人，不抢穷人吗？”

“穷人富人都抢。感谢共产党毛主席，现在没有土匪了，就是有时吃不饱肚子。”

队里每年生产的粮食要先交公粮，后卖余粮，剩下的才是村民的口粮。国家规定每人每年的口粮是360斤原粮（带皮壳）。在缺油少肉的年代，尤其对那些每天劳动强度极大，正长身体的后生小子们来说显然远远不够。当时老乡们应对粮食不足的办法之一是晚饭只喝稀粥，喝了大碗稀粥后，立即上炕睡觉。他们说，睡着了就不知道饿了。在这种情况下，每年秋收时各生产队向公社瞒产私分是普遍现象，是公开的秘密。

我们知青第一年是用安置费到旗里粮店买粮吃，那时我们对村党支部书记的微词颇为吃惊，当然也持否定态度：“什么斗私批修，没有私咋能行？没有私就都饿死球了！”很快，我们就意识并亲身体验到我和老乡是利益共同体，就帮着队里出馊主意，以便更多地私分瞒产。可是遭到了他们的拒绝：“不要过分。”

有一次，我们怀疑会计假公济私，向书记告发，他却说：“当会计的哪能那么干净？要是你们这些文化高的当了会计，会更贪，贪得更会悄悄秘秘的，让人不觉察，还不如他呢。”显然，这些话是对自认为纯洁的我们极大侮辱。但仔细想想，却不无道理。

四

多年后我们才悟到，书记对会计这事的態度，与其说是包庇，不如说是宽容。

在插队的那几年里，我们基本上没听到过男老乡之间互说是非，更没见过他们吵架打架。大姑娘小媳妇之间有时搬弄点家长里短，往往遭到家里男人们的训斥，不许她们小肚鸡肠惹事生非。这并不是说村民们相互间没有看法毫无成见，而是包容迁就隐忍是他们的做人准则和生活常态，“人人都有自己的脾性，五个手指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他们也尽量不做过分的事，尤其在物质分配上，做到尽可能地公平。要是哪次某家不可避免地沾了点便宜，下次就主动吃点亏。他们说，什么都自己占先，小眼薄皮的，我们这么小的村，祖祖辈辈能祥和地过下来吗？家族间一旦有了仇就是世仇，谁也吃不消。

高何两家私下里常说，俺们占了人家的地境。这种根深蒂固的地域观念使他们永远觉得亏欠了蒙老乡。有资料显示：16世纪30年代，土默川王爷阿勒坦汗对南逃来的汉民悉数收容，妥善安置，“汉种蒙地，蒙取汉租，各得所需，两有相济”。实际上，多年来蒙老乡向汉老乡学到了农耕技术，从而过上了更有规律有保障的生活，他们是心存感激的。蒙古族最大的特点即豪放，好客，我们从没看到他们在汉老乡面前有什么优越感，更没见过他们恃强凌弱。

我们村因为一向太小太穷，竟然连一个地主富农都没有，全村除了两户中农都是贫农，下中农。这未免令未能看到现实生活中黄世仁南霸天的我们感觉遗憾。对唯一的“坏分子”右派老禄，他们也没有阶级斗争那根弦，从不在政治上歧视，平等相待。

村里这种温和，节制，中庸，向善的和谐气氛和我们刚离开的充满阶级斗争火药味的北京形成鲜明对照。对我们当时和以后的人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

无疑，知青都是喝狼奶长大的，特别是刚刚接受过文革的洗礼，下乡后我们身上都程度不同地带着狼性，以极左为能事。

下乡不到一个月，我们公社黑河大队一个地主死了，不仅他自己的子孙，而且全村的远亲近邻都准备好按惯例要给他“大”办丧事。这种“丧失阶级立场”的举动激怒了刚下到村里的知青们。他们毅然通知公社，要造反，要把第二天的葬礼开成批斗会。这一决策得到公社领导的批准，并通知公社各大队知青第二天统统到黑河参加这个现场会。我们公社十个大队中只有我们大队把这个通知“贪污”了，我们没能上成那堂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课，更失去了难得的下乡后第一次知青聚会的机会，十分气恼。事后当我们询问书记为什么不通知我们时，他却轻描淡写地说：“那样有啥意思？我是为你们好。”见我们还梗着脖子，又说：“你们以后会念我好。”

我们下乡两个多月时，整内人党的浪潮波及到了土默川每个板申（蒙语：村庄）。开完动员会回来我们依文革惯性蠢蠢欲动，但看到村里不仅没一个老乡出头，还人人对我们避而远之，加上深感那些大字不识老实巴交的蒙老乡实在不配当“罪大恶极”的内人党员，便不了了之了。

我们旗里H公社H大队的知青参与整内入党热情太高涨了，可能他们大队领导实在没辙了吧，就把知青的花名册公之于众了。当时我们知青的档案都存放在旗知青安置办公室，每个大队只掌握知青花名册里的内容：姓名，性别，年龄，出身，政治面貌。不言而喻，“出身”是知青的死穴。大队部的这一做法与其说是对广大村民广而告之，不如说是对知青本身的震慑：知青的出身太上不得台面了，工农等红五类少之又少，全是职员，伪职员，资本家，右派，叛徒，特嫌，国民党部队起义人员等等；更可笑的是居然还有一个“奴隶主”。那是一个父亲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藏族同学的“桂冠”（据传后来其父为此事震怒，此后该同学出身一栏成了“问中组部”）。贫下中农以这样的举措“再教育”了这些知青，从此他们的革命狂热消退了。

我们公社N大队知青L，下乡后表现积极，不仅入了党，还成为内蒙古农牧学院农学系首批工农兵学员。这个学校和专业是她自己选的，意在学成后仍回农村扎根一辈子。她说到做到，果然74年毕业时回到我们公社。当时正值原内蒙三司造反司令G任我旗第一把手，G立刻将她树为知青典型。她被任命为我公社书记，此后更加豪情满怀，带领全公社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无论学大寨，还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步步紧跟。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口号下，她下令把众多农民花了大本钱，辛辛苦苦种在各家自留地里的经济作物党参统统拔了个精光。粉碎四人帮后，自治区领导没有忘记这个曾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的知青典型，把她接出来安排到城里当了生物老师。她走时知青已所剩无几，社员们对她的离别既不理睬，更没欢送。那天早上当接她的车开到村口时，她突然看见一位挨过她整的老乡正在那儿拾粪，就要求司机停车。她下车走到那位老乡跟前真诚向他告别（道歉？），突然那老汉的儿子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上去就给了她一个耳光！

就这样，贫下中农结束了对她，也是对我们的“再教育”。

□ 原载《共识网》

~~~~~

【】

我们没有自愿

• 吴道平 •

四十年前，1968年10月18日，我们，江南一所著名中学的一千多个学生，被学校的邻居，江苏省军区教导大队的军人们用几十辆军用卡车，送到农村去插队。那一天万里无云，秋高气爽，黄叶满地。我们的心情却和秋色相反，阴云密布，沉重、阴郁、惶恐：我们青春梦想在这一天破灭，我们感觉到自己正在滑向一个无底的深渊。

我在农村插队总计八年半又四天。八年半的插队生涯把我从一个曾经是“少年壮志，海阔天空”的少年折磨成浑身伤痛，身心俱疲，不敢有梦的青年。学生的时代，我们曾经怜悯那些为谋生整天奔忙的芸芸众生是“做稳了的奴隶”，八年半在农村的生活，却使我们羡慕那些“做稳了的奴隶”，反而痛惜自己“想做奴隶而不可得”了。我们一千多同学的青春还没来得及闪光，就葬送在黄土中；一千多同学的梦想从未有实现的机会，就被无情地扼杀——我们同学的父母每一天锥心刺骨的挂念，这一千多个家庭经受着长期的煎熬。而全国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一千多万，“知青”家庭有一千多万户！从东北的北大荒到云南边疆的橡胶园，从陕甘的黄土高原到东海的崇明岛，全国的农村、农场，到处留下了“知青”的血泪。

历史上的这一段，无论如何逃不过“史笔”的。那么，历史将会如何评价这场运动呢？

不同的经历、不同时代的人，自会有不同的评判标准。但是，历史事件评判的最终标准是人，是人的生存与发展，是具体历史事件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起的作用。评判这场运动的标准也只会是“上山下乡”对我们这代人的生存与发展所起的影响。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二十岁左右的“插友”，如今都已六十岁上下了，时间已经完全可以对“上山下乡”运动作出的评判：

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一辈子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一辈子没有有过理想的职业，一辈子没有有过稍稍富足的日子，许多人一辈子没有有过爱情，有人一辈子生活在“上山下乡”的阴影中，还有人因病或自杀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同日下乡的一千多人中，后来能够通过77、78年高考进入大学的竟然不足四十人，能够出国留学的只有五、六个。我们那可是一所高考入学率曾有过近100%记录的中学啊！

1992年，我回国和同班同学聚会，发现他们中的多数已经下岗、退休，无所事事地在麻将和电视剧中打发余生。当年的正值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们，生命中从未有过闪光的日子，就已经满头华发，被社会遗忘。我们在相对唏嘘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如果没有那场运动，他们怎会潦倒至此！

我们是被牺牲、被蹂躏的一代。和祖辈、父辈相比，我们和他们一样经历过三年大饥荒的饥饿，多数人却没有享受过他们曾经有过的受教育、求职、迁徙的自由；和我的后辈相比，我们中的多数没有像他们那样能够享受物质的丰富。国家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不公正地、过多的由这一代人来承担了。

我知道，这不可能成为大家的共识：当年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及其后来的继承者，为了维护意识形态上的连续性，不会对我们说一声“对不起”。当年的受害者也往往怕揭开创伤，有意无意地要在创口刷上一层色彩，使鲜血显出玫瑰色来。

今天，有人或许会说，当时你们不也曾经向党表忠心，要到农村去战天斗地、改造自己吗？不也曾经发誓要把壮丽的青春献给祖国的农村，立志做革命大业的接班人吗？

是，当初是有一些人这么做了。那是由于他们太年轻，对现状缺乏了解，对统治者无条件的信任，确实想到到农村去干一番事业。记得北京还有人到天安门去宣誓，决心去延安插队，走老革命的路，等等。

但是，我相信怀有那种浪漫豪情的人只是少数，而且他们是在真实信息被封锁的情况下做出的错误判断，是受到了愚弄。在和我一起插队的一千多位同学中间，我从没有见过这种“豪情”，哪怕是装出来的。因为农村的实际情况无法被完全封锁，我们还是了解一些；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是什么“接班人”；因为我们知道，有资格成为“接班人”的少数同学，根本就不在我们之间，他们早已经由父辈安排参军就业，和我们分道扬镳了。

是，当年我们都是“自愿”。但我们有可能不“自愿”吗？

很难。当时动员的手法，就是非让你“自愿”不可。最简单、最客气的办法是所谓“车轮战”，三班“工宣队”一天二十四小时守在你家里动员，不让你和家人睡觉，直到你“自愿”为止。两三天下来，钢铁的人也受不了，何况是血肉之躯？不“自愿”就发疯。邻居家的孩子因为数天“车轮战”而神经失常，操起把菜刀来要和工宣队拼命，结果被捕判刑。我们学校有一个被大家称为“聪明美丽而又最大气的”女同学，不过在给叔叔的信中说了句“不知命运的小舟，将把我们带向何方”，竟然被套上“破坏和对抗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而在全校批判——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法不“自愿”？

后来读到张正隆的《雪白血红》才知道，这是统治者几十年行之有效的手法：当年在东北招兵买马，也就是用这套“车轮战”而让农民“自愿”参军的。甚至会在大热天烧一热炕，让农民坐在炕上烘烤，直到“自愿”参军为止。当年斯大林统治下，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们，不仅“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是国际帝国主义间谍，还恳请法庭判处他们死刑。连冤死都能让你“自愿”。

那些真的曾经豪情满怀的下乡的“知青”们，在信息被封锁、被歪曲、被捏造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也算是“自愿”？即使退一步承认那是“自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是我不愿意把话说绝，才没有讲百分之百——很快就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很“自愿”回到城市来。那时，有人考虑过他们的愿望吗？

或许有人会说，农村严酷的环境锻炼了我们，使得我们更懂得社会，更懂得生活，生存能力更强。

是，这些都没有错。我自己经受过那场血泪生活的磨练，到海外来遇到一些挫折，就真看成“小菜一碟”，用美国人的说法，是“蛋糕一块”（a piece of cake）了。有一年母校的人事处长到美国来交流访问——她本人也曾是插队知青——看到我这么个书生竟然能自己装修房屋，踢天弄井，就曾说过，“还是‘上山下乡’锻炼人啊”这样的话。

但是，磨练了意志，学到了谋生能力，都无法补偿我八年的青春时光，无法补偿那八年在绝望中所受的煎熬，无法补偿消失了的梦想、失去的爱、损害了的健康；更重要的，运用暴力强制我的意志、限制我的自由，对我人格的污损和造成的精神创伤更是永远无法补偿。如果在自由、青春、教育、理想的自主追求和生活经验的被动获得两者之间让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我想大多数同辈人也会做同样的选择。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的青春时代有过人生一场非常特殊，前无古人，大概也后无来者的经验，值得珍视。

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人生非常特殊的经验。但，“特殊”本身就意味着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然需要！而越是惨烈的经验越特殊：“劳改”，“古拉格”的经验够特殊吧？有人喜欢吗？杀头、抄家特殊吧？除了金圣叹以外，会有人说“杀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岂不快哉”？

现在或许还会有人说，当年让我们“上山下乡”，本来是出于好意，是让我们经风雨见世面。证据是毛太子当年不也是被送到农村去锻炼的吗？

是，有些太子、公主们是去过。那真是出于他们父辈的苦心，那是为了让他们将来接班的时候不致像阿斗、晋惠帝那样轻易丢掉政权。他们去，有明确的目标和既定的程序——下农村，进工厂，去部队，进学校，学成文武艺以继承他们的事业。因此对他们不需要强迫、欺骗，他们自然也不会不自愿。对我们则从插队的第一天起就明白无误、板上钉钉地说清楚了：我们将在那里一辈子，那培养接班人“程序”的第一步对我们来说永远不会结束！如果不是人亡政息、天下巨变，这程序的第一步也确实没有终结之日。这两种“下乡”还有什么可比之处？

或许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牺牲，是为了解决当时国家的在经济、政治上的困境，因此也为国家、民族作出了贡献。

是，我们是为国家、民族，也为统治者的错误作了牺牲。但我们的牺牲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当年谭嗣同拒绝逃亡，喊出“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而毅然走向死亡，为变法牺牲，是求仁得仁，自愿如此，因此了无遗憾。而我们和他毫无共同之处，因为我们是被迫牺牲的。

因此，不管现在，还是将来，如果有人试图从这场血泪斑斑的运动中寻找什么“积极因素”，什么“闪光点”，都是毫无作用的：一场以强迫为手段而戕害了一千多万青年的运动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更不人道，在历史上当然不会得到正面的评价。手段的卑鄙从来都只反映目的的卑鄙。《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有个故事。当年他还是苏共第一书记的时候，去访问一个集体农庄。一个农民对他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是想用棍子把我们赶进天堂。”改革者赫鲁晓夫闻之大受震撼，因为他懂得“棍子”本身就是对“天堂”的嘲弄。强迫婚姻不合法、不合理、不人道并不在于婚姻的双方不般配，而在于不是出于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即使是一个天堂，人们也不愿意自己被棍子赶进去，人也应当有选择进去还是不进去的自由。何况当年赶我们去的地方，连面目狰狞、手操刀棒，心如蛇蝎的人，也不好意思说是天堂。

今天，拿一千条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万种所谓积极的因素，想为那场运动辩护都是徒耗心力：判定那场运动是国家耻辱、青年灾难的性质，只需一句话：“我们没有自愿”，那是一场浩劫，是焚书坑儒。

□ 原载《周末文刊》2012年第28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             |          |

